

范曾著

文史信步



中国文史出版社

范
曾／著

文史信步

范曾自题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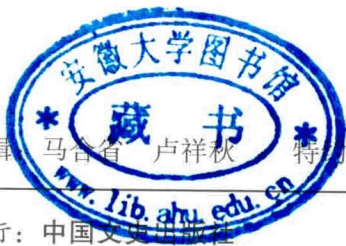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史信步 / 范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

ISBN 978 - 7 - 5034 - 5643 - 5

I. ①经… II. ①范… III. ①哲学 - 中国 - 文集②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B2 - 53
②I206.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3996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特约编辑: 张圣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5 插页: 3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谈战争与诗	1
大丈夫之词	
——论辛弃疾	32
八大山人论	59
鱼藻波寒	
——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	78
大哉， 老子之道	103
庄子的自然社会观	112
庄子的无待之境	121
庄子论道： 齐一、 无差别、 混沌	126
干支与生肖的迷雾	137
再拨迷雾	147

深閼变易之学	
——谈《易经》	150
学“行”字	
——在岳麓书院的讲话	165
《尔雅》说略	166
中国画法研究	219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谈战争与诗

战争无疑是残酷的，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是极端的暴力行为。它是死亡的信号，而不是欢乐的节日。人类的历史，悲剧多于喜剧，而悲剧的主要内容则无疑是战争。《战国策》上有一则《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当时凭恃着虎狼之师的秦王想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许。秦王对安陵君的使者唐雎说：“公亦闻天子之怒乎？”唐雎说：“臣未尝闻也。”秦王勃然，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在当时，他说得出也做得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所载，自秦献公至秦王政（秦始皇），前后屠杀晋、魏、韩、赵、楚诸国的士兵，总一百四十余万。两千三百年前没有热兵器、没有爆炸，那是排头砍去或者活埋。“纸上谈兵”的赵括四十万将士一下子全被秦军活埋。农民战争的残酷性也不例外，那作诗述怀“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黄巢，杀人逾八百万。^①那是远远超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范围的，是一种大恐怖。这样的残酷性，中西皆然。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之消灭迦太基，那是灭绝迦太基种族的大杀戮。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夏代，苏美尔人的文化在地中海曾盛极一时。然而，因为塞姆人所建的巴比伦王国的胜利，不仅这优秀的文化灭绝，这个种族也不复存在，其间战争的血腥可想而知。随着苏美尔人在地球上的消失，那唯一可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比美的一种文字——楔形文字，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

成为远古遗存的一个令人哀伤的哑谜。对那无数生灵死亡前的哭号，这哑谜只是无声的回应。自上古至近代最残酷的战争，当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此书中的每一个字，就使一百二十五人失去生命。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血淋淋、最残酷暴虐的一个统计数字。

战争当然是破坏性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①这是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大哲老子的谆谆言教。战后十室九空，赤葵依井，崩榛塞道。饥荒之后，继之瘟疫，饿殍横陈于沟壑，豺狼奔突于郊野。西晋永嘉之乱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②。

战争的破坏性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害，从古希腊帕提依神庙（约前5世纪）到中国清代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毁灭（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劫掠焚毁），所留下的庞大的残骸，无不使人对昔日繁华的一朝毁隳发出怅然的浩叹。

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所描述者非指一地，是诗人的意象之作，而所刻画有非军旅诗人可达的惨烈。“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这无穷极的灾难根源何在？这种地狱变相的人间世有无尽头？有什么办法使古战场不复出现？诗人提出了一系列的叩问。然则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对战争的源起，诗人没有可能作入木三分的判断。他说：“周逐玃狁”，对；而“秦筑长城”，错。这真是浮泛浅陋之判。

当人类石斧相向的时候，那是人文未开时的争夺，远非今天我们所谓战争的涵义。那时的氏族或氏族联盟甚至此后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伐，都只是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自然淘汰律在起作用。黄帝和蚩尤之

① 《老子·第十三章》。

② 《晋书》卷五《愍帝纪》。

战、黄帝和炎帝之战都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也没有效忠君王的伦常。我想象那时的黄帝一定孔武有力、智商超群，力足以斗群雄，智足以伏诸夷，绝对是从荒蛮中砍杀出来的强者。那时的人群还没有道义的框架左右他们的思维，也没有伦理的绳索制约他们的行动，他们要保卫的乃是生命赖以存在的土地和食物。《三才图会》上画的黄帝已带着帝王的冕旒，那真是荒谬有趣。那是后代的画家据《周礼》凭空杜撰出来的偶像，似乎华夏的初祖不应披着兽皮麻葛，正应穿着这种天子的礼服接受万国来使的朝拜。古代也没有天子的概念，禅位云者，不是由于尧舜有着高尚的品德，只是那时私有制观念淡漠，因之部落联盟族长的传承与血统关系不大。战争成为一个涵义确凿的词汇时，国家必已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战争以道义和伦理为其后盾并以为号召，那应当是商汤伐桀时开始，中国诗的源头《诗经》也正可以上溯至此时。

对人类历史存有总体性怀疑主义和对战争抱着彻底悲观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应属明末清初的归庄。他有着国破家亡之痛，对民族的深爱而转变为深恨，诗中所隐含的激烈的愤怒，化为表面的嬉笑怒骂。从天地开辟、三皇五帝开始，他一个也不轻饶：

太极混元苞，却被那盘古皇无端啰唆，生刺刺捏两丸圆弹子，撮几粒碎尘砾，云是乌飞兔走，岳镇也山朝。更蛀几条儿疥虫路，挖半掌儿蛙涔道。到如今，昆仑万仞撑天柱，江汉千支入海潮，弄这虚器。

那女娲氏，你断什么柱天鳌？那有巢氏，你架什么避风巢？那不识字的老伏羲，你画什么奇和偶？那不知味的老神农，你尝什么卉和草？更有那惹祸招非的老轩辕，弥天摆下鱼龙阵，象意装成虎豹韬，便留下一把万古杀人刀。^①

① 归庄：《击筑馀音》。

好一把“万古杀人刀”！他知道从此人世不复太平。这一把杀人刀，只是人类从远古生物状态时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保残他的遗传基因的物化。生命都有弱肉强食的一面，又有畏生怖死的一面。而到了高级生命的人类，会把这种相反相成的本性、潜藏的凶残和怯懦发挥到极致。

人类社会在前进，当物质生产非止供果腹而有剩余时，私有制应运而生，国家的萌芽乃成为早晚的事。上古大禹，一改尧舜禅位之制，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奴隶制国家形成，而且有了国都，竟然一统五百年之久。此后由商而西周而春秋战国，由奴隶制而封建制，为维护一统国家和中央权威的伦理、道义的观念方才出现。至少在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300 年间，也就是春秋末至战国后期，维系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概念、思想和学术派别等业已形成。

对于这一切，归老先生都给以过激的抨击。他说：

最可笑那弄笔头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髅，提得他没颠没倒。^①更可怪那爱斗口的老峰山，把五帝三王的大头巾磕得人没头没脑。^②还有那骑青牛说玄道妙（指老子），跨鹏鸟汗漫逍遥（指庄子）。也记不得许多鸦鸣蝉噪、秦关楚峤、兰卿鬼老，都只是扯虚脾斩不尽的葛藤，骗矮人弄猢猻的圈套。^③

痛快，骂得痛快！庄子是应了佛家的果报了。当初他恣纵不挠的无端崖之词，骂得儒、名、墨诸家无地自容，只今竟如何？还有骂得更凶的！痛快之后又如何？归老先生似乎缺少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

① 孔子注《春秋》，载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计二百四十二年历史。

② 指孟子。峰山地处邹邑，孟子家乡。

③ 归庄：《击筑餘音》。

忧”的责任感。他骂够了，“俺老先生摆尾摇头再也不来了”。他去“望云涛海涛”、“倚梅梢柳梢”，过他“没些个半愁半恼”的日子去了。果真无愁无恼了吗？归庄是封建社会里第一个敢于对社会历史和社会陈见全面地提出正面攻讦的叛逆者。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判断，这《击筑馀音》是一阵生命剧痛的宣泄。“诗意的判断”与“理性的判断”之不同，就在于“诗有别趣，非关理也”^①。我们当然不能从归庄的长曲中识得历史的真面，但是他的长歌当哭、他的彻底的战争悲观论来自人类战争本身的悲剧性，加上归庄的泉飞藻思，其感人至深，堪称沁人肺腑。

战争绝对能激活人类生命中好斗的因子，也许这在太古之世是人类从万物生灵中脱颖而出的原因。然而当私有制产生后，好斗就包含了更多的占有欲的驱使。蒙古草原已够辽阔，匈奴人一定要到塞纳河（公元4世纪）、蒙古骑兵一定要到波兰的维斯瓦河饮马（公元13世纪）吗？毡裘之君长和农耕社会的帝王同样有着难填的欲望。而人类往昔的一切过错之根源，无非佛家指出的贪、嗔、痴三字。秦始皇占有一切荣华，他“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②，还有“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骏良骅骝”、“江南金锡”、“西蜀丹青”，但名相李斯以为这些还不重要，他希望秦始皇不要驱逐异国的贤才，如穆公时之百里奚、孝公时之商鞅、昭王时之范雎，有类似这样的人才，方可无敌于天下。

历史的偶然性所描绘的画图，完全非所逆料，被南匈奴和汉人击败而遁逃的北匈奴人转麾西向，在几世纪的迁徙中发现了极其富庶的西欧。强悍的匈奴人使欧洲的君王直至教皇闻风丧胆，他们得到了在东方失去的一切。古代战争包含着奴隶制社会所特有的蛮干精神和封建主

① 严羽：《沧浪诗话》。

② 李斯：《谏逐客书》。

的强悍之气。那时掠夺和占有是唯一的目的，而“力”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原因。“力”有着一种特殊的象征性。在上古，斯巴达人正是凭着“力”，写过他们辉煌的历史。因为在彼时，胜利属于“优秀民族”，“力”是它的徽号。而憎恨祖国贫穷和衰弱的近代中国文化启蒙者梁启超和鲁迅，都曾是斯巴达精神的鼓吹者。然而在斯巴达人“力”的背后，没有太多的道德和伦理的说辞。东方也不例外。当成吉思汗的部将问军队打向何方时，成吉思汗用他的马鞭指着远方讲：“天边！”那也是绝无道德和伦理可言的。即使成吉思汗已死多年，余威仍震于殊族，他的孙子拔都统帅的铁骑和手中的火器足以使条顿武士的利剑黯然失色，杀得他片甲不留、流血漂杵（公元1241年）。这些威武壮阔的战争用血和火翻开人类历史的沉重篇章，当时的西方似乎在武力上并不占绝对的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大一统的王朝已然形成的时期，对外的扩张不是当务之急。汉武的开边为的是把匈奴人驱赶得更远，以保自身的安全。农业社会需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需要四时运转、春播秋穡、夏耕冬藏，因之相对的安定是农业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自卫性成为古代中国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共同要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虽然是暴秦为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北筑长城的目的，却也是老百姓的期望所在。暴秦的“暴”主要是对付国内的“弯弓而报怨”的起义和六国君王的复辟，维持大一统是秦代的绝对命令。

远在孔子提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时候，其中射、御两项便成为士人的功课，可作为中国人尚武精神的体现。在此，孔子是将其置于礼、乐之后的。孔子之思，首先还是“尚文”。至战国之世，各国名将辈出，“吴起、孙臆、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①。此举其大者而已，秦国的白起更是诸将的劲敌。春秋时的管仲、孙武之属则可称杰出的军事学家。自东周而汉、晋、

^① 贾谊：《过秦论》。

唐、宋，武力的职能主要是两方面：对内平叛，对外御胡。历史上对华夏以外的民族统称胡。元代比较特殊，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在1206年。1216年西征，灭花剌子模与钦察，其间的残酷屠杀是世所罕见的，其血腥染遍了一部《元朝秘史》。因为察合台之子莫阿都平的阵亡，惹恼了祖父成吉思汗。这大汗之怒是足以使天地变色的，他将整个花剌子模的巴米安城杀得精光。这笔账实在不能算在中国人的头上。成吉思汗在中亚施暴，距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代、定都大都还有五十五年，那时成吉思汗已死了二十二年。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历史，元代毕竟在中国完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结束了辽、金、西夏在北方和西南大理的政权，因为强悍，幅员广大，边疆不再有侵扰。廿五史中有《元史》，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至于成吉思汗被追认为元太祖，那是忽必烈的事。这位天可汗与我们的关系比蒙哥汗、忽必烈遥远得多。尚武自卫而带有侵略性的拓疆还有最著名的唐代高仙芝，以塞外雄风著称的军旅诗人岑参当时正在他的麾下。

任何民族从它们的童年开始，便知道尚武是本民族得以存续的根本。每个民族都有英雄崇拜的情结。战争所保卫的主要是该民族的文化。而不同的民族由于有着不同的生存条件和人文传统，每一个民族对英雄人物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歌颂本民族的辉煌历史（主要部分应该是战争史）和英雄人物，在上古历史的诗歌中尤为突出。无论希腊荷马史诗或中国《诗经》中的《商颂》、《鲁颂》、《大雅》和《小雅》都是如此。荷马史诗和《诗经》创作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诗人个人的创作，而后者则是殷周以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前者未经别人删选，而后者却是由孔子删选的，其中必注入了孔子个人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这是孔子对《诗经》结论性的名言。“诗言志”^②是孔子对诗的艺术本性的要求；而“《诗》

① 《论语·为政第二》。

② 《尚书·舜典》。《尚书》传为孔子所编。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①，则是孔子对诗的社会功能的要求。这些论述要言不烦、切中肯綮，表现了孔子先贤大哲的胸怀。然则孔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全部伦理观、道德观的创说者和捍卫者，他首先要维护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秩序，也就是“克己复礼为仁”^②的社会理想。而他所处的时代又与他的社会理想相龃龉，那是周天子形同虚设、群雄并起的时代，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诗经》在孔子看来几乎是可作为内政外交的必读书。“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③既已诵《诗》，所求在用，学而不用，“亦奚以为”？读《诗》是为了从政可以顺畅，出使列国善于应对，显然孔子是把《诗》作为实现他社会理想的工具了。孔子从三千余首中遴选三百零五篇^④，无疑有着他的伦理、道德标准。删去的、不可“施于礼义”者，果真就都“邪”吗？不一定。甚至桑间濮上之音，或者正是真诚的爱情之歌。在孔子，绝不可理解希腊的《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与特洛伊王子为美人而战的精神。因此，我们对孔子所选的有关战争的诗歌必须清楚，这些作品应与孔子的“礼”和“仁”相契合。当然，这些诗早于孔子，那么孔子以后，受孔子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诗意的判断背后有着伦理的判断和道义的判断，这是不足为奇的，甚至最天才杰出的诗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地在作品中流露这种理性。完全超越这种理性的诗也有，但很少，或者说不是战争诗的主体。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仁”和“礼”两个巨大的思想符号。“仁”作为孔子心灵层面的理想境界，那是至高至极、至美至善的存在。在《论语》中，“仁”字出现凡一百零九次，其中包括有孔子的夫子自道、有同问异答的师生对话、有弟子之间的相互应答。“仁”字望

① 《论语·阳货第十七》。

② 《论语·颜渊第十二》。

③ 《论语·子路第十三》。

④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之弥高，即之则温，它是那样平和地存在着，质朴得宛如宇宙本体的存在。它虽然崇高，但非不可及，人人可以去追求。孔子的“有教无类”^①，倒不是他在阶级意识上的平等不二，而是针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期求。但每个人必须躬身力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②这“欲仁”二字，宛若佛家之“得悟”，它们都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不是做了一件事便可永为“仁人”，永远成佛。此时得悟，此时为佛；彼时迷障，彼时为众生。“仁”亦然，依仁得仁，不厌不倦，方可“斯仁至矣”。“仁”，虽不是高不可攀，近在咫尺，然而达到“仁”并不容易。连颜回那样的最得意的弟子，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③，孔子也就十分满意了。

《论语》中的“礼”，则是现实层面的最高境界。如果说“仁”是至美至善的终极目标，那么“礼”则是依伦依常的高度准则。“礼”乃为实现“仁”的手段和规矩，即所谓“礼义以为器”^④，俗谓之游戏规则。而孔子的“礼”当然指周初之礼。在他的心目中，有一个被他理想化的，完全符合封建伦常的时代，那就是周公的时代。周公是孔子的偶像，而他毕生的奋斗则是希望在“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礼崩乐坏的乱世，回归那遥远的古代。

孔子所推重的周初之礼，见于《论语》和孔子或其他儒家所编《尚书》、《周礼》、《礼记》、《左传》、《国语》诸经典。其中所论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皆为封建社会必须遵循的大秩序；而破坏礼制的人，则必然是乱臣贼子。至于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民咸安其居”，“不可推移”^⑤。对这种

①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② 《论语·述而第七》。

③ 《论语·雍也第六》。

④ 《礼记·礼运》。

⑤ 《礼记·王制》。

和平融洽、相安无事的生活的破坏，当然是非礼的不仁之行。

周公本人为民立极，以自己的道德，使人知道父子、兄弟、君臣、长幼之道。武王与成王是父子，武王与周公是兄弟，武王死而成王年幼，周公辅之是君臣，而周公乃成王之叔父是长幼，其间封建的伦常，周公表现出无私秉公的典范，可称圣人之行。^①礼，成为做人的根本：“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②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③。

孔子希望通过“礼”而使“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则可行“仁”，这首先得有“仁君”。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统治者的表率是仁政的根本。“‘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⑤这一方面是孔子替自己任鲁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辩护，也同时说明“胜残”——去酷刑，不再毁肌肤、断肢体，“去杀”——废除死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个人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是以身殉仁。生死亦大矣！生与死乃是人生的最终选择。真正的、完美的人，孔子称之为“仁人”、“志士仁人”。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⑥同样，孟子以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⑦“义”是完成“仁”的忠信壮烈之路。依仁之义也是可以以身殉之的最高境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

① 参见《礼记·曾子问》。

② 《左传·昭公七年》。

③ 《论语·泰伯第八》。

④ 《论语·颜渊第十二》。

⑤ 《论语·子路第十三》。

⑥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⑦ 《孟子·告子章句上》。

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①君子能直面死亡而最后完成崇高的不朽人格，这就是死得其所，就是重于泰山的英雄人物之死。

以上所述一切，对华夏民族的成长，对仁义之师的战争，对战争中英雄人物的出现，对战争诗歌的形成，都有着伦理与道德的潜在意义，构成了华夏民族的心灵的命令。

战争是残忍的，是破坏性的；战争是雄阔的，有激励性的。每个民族在历史上为求生存，必须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战争。人们知道尚武的对立面是怯懦，前者生存，后者死亡。而在古代，正义与非正义则是用仁、至仁与不仁、至不仁来判断。战争之成为审美对象，不是由于它的血腥和屠杀。中国古典诗歌自上古以来就有着言志述怀、依仁见义的传统，其间可大致分为下列类型：一种是基于战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理性判断。这样的诗大部分是对胜利的君王将帅的讴歌，对舍身捐躯的英烈的缅怀，场面宏阔，气势壮烈，但缺少精微的心灵内省。这些作品的作者有军旅中的文人、朝廷的命官或者君王本人。一种则是基于对战争本身的深切体悟而不失赤子之心的个人心灵判断。这类虽属纯粹的个人感怀，但往往战争带给他们无限的创伤与哀痛，所摧毁的曾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之这些诗有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往往由此引发出人性中的深沉忧伤。其中如大量的征愁闺怨之诗，感情真挚而动人。还有一种是上述两种兼而有之的。这类诗大体出于有深厚文学修养、道德修养而且亲自加入攻城野战、斩将搴旗的战斗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诗悲壮激越，震撼人心，不愧英雄本色。当道义、伦理与个人灵魂化为一体的时候，当这一切又化为他们的诗篇时，他们就带着光环走进了“仁人”的殿堂，堪称华夏之脊梁。不易归类但绝不可忽视的，是格高境大、不写战争的战争诗，譬如南唐李后主北狩后的某些名篇。由于他从现实的帝王而沦为囚徒，其间的落差真可谓“天上人间”，然而他的卓越之处在于

^① 《孟子·告子章句上》。

他回避一切对战争的直接描写，一转而为超验的心灵叩问。任何人读他的词都会有一种广大无边的悲怀。这是李后主作为词人内心忏悔意识的诗化。王国维谓“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即是指此。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极少侵略、掠夺性，而防御自保成为战争正义性的前提，于是激于理义乃是中国古代战争“道德”、“伦理”的正义之旗。

“中国”一词所从来远矣，据《礼记》所载，最晚在周代已然流行。“中国”——华夏民族，当然是相对于四周的蛮貊之邦所自称的。然则夷夏的区别，不是恒居而不变的，至战国之世，被称为荆蛮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已自谓“帝高阳之苗裔”，和三皇五帝挂上了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中国”亦即主要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华夏族，一直是主流文化的承担者，那是不争的事实。直到三国建安诗人王粲还在《从军诗》中称“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则在诗人心目中，连孙权还是夷人。以华夏为中心的思想有着历史的、文化的渊源。历史告诉我们，自殷周以降，獫狁、羌戎、鬼方，汉代匈奴，南北朝五胡，唐突厥，宋契丹、女真、党项，然后元（蒙古），清（女真），直至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和骚扰，真所谓边患孔亟，略无间日。华夏的物质富庶和文明昌盛，成为他们侵掠的不二目标。中国不是一个甘受欺辱、宰割的民族，自虞舜、商、周、汉、唐之季，似乎绰有余力对付边患。也就是在冷兵器时代，中国的武器在彼时当属先进，而使用武器的人本身不是羸弱的群体，所以不致因侵袭而屈辱；加上传统的道德力量，历史上的确形成过“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在承平之世，华夏民族与西方之以暴制暴不同，往往以柔克刚，怀柔之、联姻之、封赏之，希望以夏变夷。由石斧、石刀到剑戟铍钺，在战史上称冷兵器。殊不知由“冷”而“热”的转化的肇始者却是中国。当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对准义和团勇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